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柳永词选

过常宝◆撰

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# 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过常宝◆撰

柳

永

词

选

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永词选/过常宝撰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  
(古代诗词典藏本)  
ISBN 978-7-100-10783-9

I. ①柳… II. ①过… III. ①宋词—选集 IV.  
①I222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4731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柳永词选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过常宝 撰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0783-9

---

2015年3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40 1/32

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8 1/4

定价: 25.00 元

## 古代诗词典藏本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编 委 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曹 旭 | 陈祖美 | 程章灿 | 过常宝 | 蒋 寅 |
| 刘 石 | 刘扬忠 | 莫砺锋 | 钱志熙 | 王兆鹏 |
| 钟振振 | 周洪波 | 左东岭 |     |     |

策 划 厚艳芬

# 走出学术象牙塔

刘跃进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。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，但精品甚少。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，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；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，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。这样一种偏见，必须改变。

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，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，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。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、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，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。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？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，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，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。近来翻阅《王伯祥日记》，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、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《诗经选》《史记选》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《三曹诗选》《唐诗选》《宋诗选注》的工作，印象深刻。每一部书的编纂，从篇目的确定，到注释的推敲，都经过反复打磨。然后内部油印，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、高等院校，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。经过这样几个回合，才最后定稿，公开出版。这样的书，阐释经典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，多数印行在数

十万册以上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，也逐渐走出学术圈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。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启示之一，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。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，说易行难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明确指出：“人民要求普及，跟着也就要求提高，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。在这里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，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。而这种提高，不是从空中提高，不是关门提高，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。这种提高，为普及所决定，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。”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，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。没有普及，何来提高？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。现在，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，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。这种观念值得商榷。毫无疑问，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，给予尊重，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，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，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，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道理不言自明。但同时，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，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。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，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、依靠群众。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，那就成了无根之木，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。这道理不言而喻。

启示之二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。康德《逻辑学讲义·导论》说过：“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。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

人，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。”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。提高在前，普及在后。普及不是随意发挥，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。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，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。没有深入的研究，哪来生动的普及？王伯祥、余冠英、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。对学者而言，深入易，浅出难。浅出所以难，是对作者要求高，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，才不至于把经念歪。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，而要讲给大众听，就无法藏拙。因此，做好普及工作，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积学储宝、研阅穷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，也才会更有意义。

启示之三，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，更是传递一种理念，一种理想，甚至还可以说，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。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，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。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，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，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文学研究工作者，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，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。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，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，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

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，恰逢其时，其意义自不必多说。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，他们以“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”为追求，其选家皆术有专攻，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，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。

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、研究特点不同，因此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，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。这里仅举数例：李山教授的《诗经选》，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“诗经世界”的新旅——重新审读其字句、篇章，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，勾勒其礼乐背景，体味其文化意蕴，欣赏其风雅艺术，考察其歌唱方式……《王维诗选》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，王维诗乃诗之哲学，亦可谓哲学之诗。故其选评，敏于感悟，精于赏玩；其评赏文字，巧于切入，工于辞采。《李清照诗词选》的作者陈祖美先生，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，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“心事”——幼年失恃、党争株连、婕妤之叹，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，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。

无须赘言，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，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。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，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，这一点，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。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就特别强调自己“注”的特色，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。希望这种不拘一格、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，贯彻丛书始终，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，既不乏前沿理论、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



的精品选本。

丛书付梓在即，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，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，这种信任让我感动。确实，好书好序，相得益彰。如果翻开一部新书，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，就好像刚出门，便遇上障碍物，诚可谓“出门即有碍，谁谓天地宽”，叫人眉蹙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早就告诫：“凡书有所发明，序可也；无所发明，但纪成书之岁可也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”贸然作序，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。但我想，好书确实需要介绍，好意也要有所表达。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，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。

六十年前，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，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，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，取得空前成就，影响至今。我们相信，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，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，为广大读者所认可。

2014年5月30日

草于京城爱吾庐

## 导 言

### 一

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影响的词作家，在词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柳永，福建崇安人，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（987）<sup>①</sup>，原名三变，字景庄，后来改名为永，字耆卿，因排行第七，人又称柳七。柳永为河东柳氏之后，五代战乱时，其祖父柳崇隐居至崇安县五夫里的金鹅峰下，自称处士，以儒学知名乡里；父亲柳宜，曾任南唐监察御史，入宋后，登进士第，官至工部侍郎，以孝行闻名；柳永五个叔父以及两个哥哥，都有功名。柳永生长于一个崇尚儒学、科第的传统家庭，青少年时代接受了很好的教育，并受到正统思想的熏陶。

柳永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，作有咏崇安名胜的《题建宁中峰寺》诗（载录于清人厉鹗等所辑《宋诗纪事》卷十三）。及至青年时代，柳永满怀抱负来到汴京，参加进

---

① 关于柳永的生年，史无明确记载，此处依据唐圭璋先生的说法。详见其所著《柳永事迹新证》（《文学研究》1957年第3期）。此外，柳永的生年还有如下几种说法：陆侃如《中国诗史》（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626页）认为约是太宗淳化元年（990），李国庭《柳永生平及行踪考辨》（《福建论坛》1981年第5期）认为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，李思永《柳永家世生平新考》（《文学遗产》1986年第1期）认为是宋太祖开宝四年（971）等。

士考试。在初考失败后<sup>①</sup>，作《鹤冲天》词云：

黄金榜上，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，如何向。未遂风云便，争不恣狂荡。何须论得丧。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烟花巷陌，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寻访。且恁偎红翠，风流事、平生畅。青春都一饷。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

词中抒发了怀才不遇的牢骚，暗含着对朝廷的讽刺和轻忽，因而惹起宋仁宗的不快。宋人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六云：

仁宗留意儒雅，务本理道，深斥浮艳虚美之文。初进士柳三变，好为淫冶讴歌之曲，传播四方。尝有《鹤冲天》词云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及临放榜，特落之，曰：“且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！”

又宋人严有翼《艺苑雌黄》载：

柳三变，字景庄；一名永，字耆卿。喜作小词，然薄于操行。当时有荐其才者，上曰：“得非填词柳三变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上曰：“且去填词。”由是不得志，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，无复检约，自称云：“奉旨填词柳三变。”

以上应该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版本，皆言宋仁宗对柳永牢骚太盛非常不满。一般来说，历代文人都会有些不遇的感慨，本不足为奇，宋仁宗也不会特别在意。但柳永所谓

① 柳永何时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亦不详。谢桃坊推测：“柳永大约是在真宗天禧元年（公元1017）前来东京应试的。天禧三年（公元1019）……仁宗天圣二年（公元1024）……天圣五年（公元1027）……这三次考试，柳永都是参加了的。”（《柳永词赏析集》，巴蜀书社1996年版，第263页）

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，听起来有些特别。推测起来，前人往往将“浮名”和“隐士”相对，而柳永选择的是“浅斟低唱”，似乎有些形而下，对朝廷的功名就有些嘲弄的意味了。可能这一点刺激了仁宗的某根神经。当然，从这首词和相关的记载中，也可以看出柳永在京城的生活状态。风流生活导致了科考无望，而科考无望，又使得柳永变本加厉地投入到放纵情感的生活中去。这大概就是青年柳永的京城生活。

这样，柳永在考中进士之前，大约蹉跎了十余年的时间。由于屡次失意于会考，柳永的处境十分尴尬，有时不得不流寓他乡，四处寻找着生存的机会。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他的具体踪迹<sup>①</sup>，大致可知的是，他主要是顺汴河而东，漂泊于淮、楚、江、浙一带，此外，还可能到过成都、西北一带。柳永的漂泊，很可能是为了寻求作幕的机会，或是在地方官府谋职。但这一段的漂泊生涯，留给柳永的只是灰黯的记忆，他在词中不断地表达了羁旅困顿，以及自己对奔波往来的厌烦之情。艰难的流荡，给柳永以更加惨痛、更加深刻的人生体验，也使得柳永的词作更具内涵。

景祐元年（1034）正月，仁宗有感于“取人路狭，使孤寒栖迟”，乃诏天下曰：“其令南省就试进士、诸科五举；及尝预先朝御试，虽试文不合格，毋辄黜，皆以名闻。”趁

① 王季思《怎样评价柳永的词》（《中山大学学报》1959年第1、2期合刊）云：“（柳永）自称‘奉旨填词柳三变’，在汴京、杭州、苏州等地方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。”似乎认为柳永是不断地往来于京城和外地的。谢桃坊《柳永事迹考述》言柳永在京滞留十年后，才往江南，直到景祐元年前一两年才回京，遂即中进士。

此良机，柳永再次参加了进士考试，并与兄柳三接同榜中进士。他作《柳初新》（东郊向晓星杓亚）词表达自己此时的兴奋之情：

别有尧阶试罢。新郎君、成行如画。杏园风细，桃花浪暖，竞喜羽迁鳞化。遍九陌、相将游冶。聚香尘、宝鞍骄马。

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虽然是姗姗来迟，可这毕竟是一生的梦想。此时柳永已将近五十岁了。

柳永始授睦州（今浙江建德）推官，这是一个掌管簿书记事类琐事的佐官。柳永是当时知名的文士，所以立刻得到上级官员的注意。据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六所载，柳永到睦州才月余，就得到知州事的吕蔚的举荐，但被侍御使郭劝以任官月余难有政绩的理由驳回。这是柳永任官来首次受到的挫折。

睦州之后，柳永曾任过昌国县（今浙江舟山定海）晓峰盐场监，并作有长诗《煮海歌》，通过对煮盐过程的描述，表现了盐民的苦难处境以及自己的同情之心。清人朱绪说此诗“洞悉民瘼，实仁者之言”（《昌国典咏》卷五）。又据清嘉庆《余杭县志》卷二十一《名宦传》引旧志云：“柳永字耆卿，仁宗景祐间余杭令，长于词赋，为人风雅不羁，而抚民清静，安于无事，百姓爱之。建玩江楼于南溪，公余啸咏，有潘怀县风。”柳永文人心肠，又长期漂流，应当能够体恤民间疾苦，所以为官当不至于苛酷。不过，这则记载的年代似有出入，因为柳永景祐初年方为睦州推官，须经“三任六考”，而他又“久困选调”，不可能在景祐年间升任

为余杭县令。也有可能是柳永多次往来于杭州，后人附会其为余杭县令。此外，他还可能任过华阴县、灵台县令<sup>①</sup>。

按当时官制，柳永所任的推官、盐监、县令等低级地方官员，要待循资考满后，有人举荐，才能改任京朝官。但柳永的磨勘转官是很不顺利的，据王辟之《澠水燕谈录》记载：

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……皇祐中，久困选调，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。会教坊进新曲《醉蓬莱》，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，史乘仁宗之悦，以耆卿应制。耆卿方冀进用，欣然走笔，甚自得意，词名《醉蓬莱慢》。比进呈，上见首有“渐”字，色若不悦。读至“宸游凤辇何处”，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，上惨然。又读至“太液波翻”，曰：“何不言波澄？”乃掷之于地。永自此不复进用。

柳永再次因为一首词而开罪于仁宗，以至于“不复进用”。这种事情似乎太过穿凿，但柳永的词名确实对他的仕途有着不好的影响。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，他还去拜访过同是词人的宰相晏殊，结果受到晏殊的奚落。因此，柳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，一直流寓于外地，担任着小官的角色，仕宦生涯十分落寞。这表现在他的词中，有不少“游宦成羁旅”“游宦区区成底事”“念名利，憔悴长萦绊”的感叹。

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谓柳永“后改名永，方得磨勘转官”<sup>②</sup>，颇经历了一番曲折，才又回到京城。经过一些小的

① 分见宋人罗烨《醉翁谈录》、柳永之侄所作《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》。

② 柳永改名，亦有说是在考进士之前的，亦有说是中年为祛病祈寿而改的。

职务，最后仕至工部屯田员外郎，为从六品，是个级别很低的职位。柳永约皇祐五年（1057）卒于南游途中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下云：“永终屯田员外郎，死，旅殡润州（今江苏镇江市）僧寺。”后来被移葬于丹徒（今江苏丹徒）的北固山下。

柳永一生身沉下僚，不见经传，以上所列陈，亦难免有传说之处。而宋后戏曲、小说中的描写，如《柳耆卿诗酒玩江楼》《众名姬春风吊柳七》等，皆出于附会，我们只能从中看到柳永在社会上确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## 二

纵观柳永一生，以“风流”二字最为关键。柳永以“浅斟低唱”享词名于当世，又貽人以“薄于操行”的口实，甚至因此见斥于朝廷，蹉跎终生。那么纵情声妓的行为，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柳永本人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一问题，是我们认识柳永的前提。

自中唐以后，城市经济在中国得到发展，城市中的游乐活动也随之迅速地繁荣，歌楼妓馆极为发达。经晚唐五代，声色享乐之风愈演愈烈。《太平广记》引《唐阙史》云：“扬州胜地也。每重楼向夕，倡楼之上，常有绛纱灯数万，辉罗耀烈空中。九里三十步街中，珠翠填咽，邈若仙境。”这种社会风气会对文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，并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。所谓“自南朝之宫体，扇

北里之倡风”(《花间集序》),成了晚唐五代文人的典型写照。北宋初年,社会承平,都城汴京仅在籍人口就达五十五万,另有行商、游宦、守军等数十万,使得这一城市空前繁荣。《东京梦华录序》记录此际盛况云:

举目则青楼画阁,绣户珠帘。雕车竞驻于大街,宝马争驰于御路。金翠耀目,罗绮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,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……花光满路,何限春游;箫鼓喧空,几家夜宴。伎巧则惊人耳目,奢侈则长人精神。

显然,这样的社会环境,一定是得益于较为宽容、松弛的社会意识形态,并且得到统治阶级的纵容。

北宋的皇帝公开教导大臣要“多积金,市田宅以遗子孙,歌儿舞女以终天年”(《宋史·石守信传》),宋徽宗居然使大臣“短衫穿裤,涂抹青红,杂倡优侏儒,多道市井淫媒谑语”(《宋史·蔡攸传》),这恐怕并不仅仅是某个皇帝昏庸的问题,它也是社会风气的反映。北宋大臣又多表现为两面:一面为儒为臣,高头讲章;一面流连声色,浅斟低唱。因此,有诗、词之别,前者以写儒雅纯正,后者以写风月性情。欧阳修似乎可为代表。其《减字木兰花》云:“樱唇玉齿,天上仙音心下事。留住行云,满座迷魂酒半醺。”和柳永词作很相近,由此可见文士的风气了。

在这种社会环境下,柳永虽性情浪荡,行为风流,但不算特别不近情理。罗烨《醉翁谈录》丙集卷二云:“耆卿居京华,暇日遍游妓馆。所至,妓者爱其有词名,能移宫换羽,一经品题,声价十倍。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。”柳永自己在词中并不隐讳他和歌妓的密切关系。与此相类似的



另一则记载见于陈师道的《后山诗话》：“张子野老于杭，多为官妓作词，而不及靓（妓名）。靓献诗云：‘天与群芳十样葩，独分颜色不堪夸。牡丹芍药人题遍，自分身如鼓子花。’张子野于是为作词也。”张先官至都官郎中，且又年老，尚不怎么收敛，可见社会是容忍这些行为的。《后山诗话》又载：“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，作新乐府，骯骯从俗，天下咏之，遂传禁中。仁宗颇好其词，每对酒，必使侍从歌之再三。”可见，皇帝对柳永也是能欣赏的。从朝廷到民间的反响，反过来又不能不鼓舞柳永的行为和创作。

柳永漂泊京城十数载，不但要纵情歌酒，还要到处漫游，其经济来源恐怕在不小程度上要仰仗自己的作词本领。为了满足这一重需要，他又不得不奔走于京城的歌楼妓馆之中。这样，就形成一个不得已的循环。当然，柳永沉溺于浪荡生活当中，还有更为深层的心理、精神方面的原因，我们在下文将会谈到。

那么，一定要说柳永“薄于操行”，恐怕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他，更在于他的社会影响力。张海鸥说：“宋代允许妓女存在，也允许官僚们听听她们的歌，看看她们的舞，甚至自家也可以养几个歌儿舞女。但像柳永这样总是在烟花巷陌中寻访意中人，眠花宿柳，而且还把这种生活体验不无夸张渲染地写出来，到底有些过分，做官总不太合适。相比之下，柳永是过于率真任性了<sup>①</sup>。”也就是说，柳永可以依红偎翠，也可以写

① 《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》，载《学术研究》1997年第3期。